



■本报记者 董沛 钱培坚

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,是“新中国第一只股票”这个故事的主角——泰其斌、黄贵显。

24年前,他们和其他人一起,联手做出了一个“出格”的创举;泰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“飞乐音响”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;黄贵显冒着风险把“飞乐音响”股票卖了出去。

在股民的记忆中,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。

现在,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,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入市融资。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。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。

“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。”泰其斌说,“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,每股50元。”

在深秋的上海,两位已经淡出江湖、颐养天年的老人,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“新中国第一股”的一幕……

###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,就搞了股份制

故事始于1984年。这一年,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。泰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,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,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。

1958年,泰其斌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专业,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。1984年,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。

那时,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,给电视机厂做配套。泰其斌上任的这一年,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,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。那是一段令人轻松愉悦的日子,城市街头,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,《再过二十年,我们再相会》的歌声,是最好的伴奏,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。此外,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,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,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。

泰其斌对市场很敏感,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。他的想法,被主管部门同意了,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,专事音响生产,但在资金、产品完全由计划支配的年代里,这家完全属于计划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,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。

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。泰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,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,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。“股票”这个词,第一次被泰其斌所知,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,泰其斌理解的“股票”,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。

能集到资,当然是件好事,泰其斌回厂里后,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。

就在这之前三年的1981年,一个叫作“国库券”的词,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。这一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,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,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,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。作为中期政府债券,国库券年息4厘,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,自发行第6年起,一次抽签,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,每次偿还总额的20%,10年还本付息。

泰其斌那时认为,国家集资发行“国库券”,企业集资发行股票,一样的道理。他并不知道,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债务关系,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系。他发行股票,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。“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,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,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。”泰其斌回忆说。

就这样,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,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。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,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。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。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,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——改革开放后最早股份制企业之一,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如今,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,泰其斌还是觉得,在那时它就像一个“怪胎”,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,诞生了。

### 一个经常“脑子发晕”的人,成了证券“拓荒者”

也就在这个时候,为了飞乐音响发行股票,黄贵显走入人们的视线,开始了自己的证券人生。在此后的岁月里,他成为了中国证券行业一个真正的“拓荒者”:第一家代理股票发行,第一家开设证券交易柜台,第一家推出国库券交易,第一家代理发行B股,第一本证券业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教材、第一本股票年报……这些背后,都有黄贵显的名字。

今年7月,在上海常熟路171号中银万国证券公司的一间会议室里,80岁高龄的黄贵显满头银发,依旧头脑清晰。老人有一个相册,里面都是他经历过的一些历史照片,这当中,有大家为飞乐音响、延中实业发行股票召开研讨会的情景,也有中国最早进行股票柜台交易时的场景……照片讲述的,是黄贵显的人生,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健全过程的



■本报记者 董沛 钱培坚

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,是“新中国第一只股票”这个故事的主角——泰其斌、黄贵显。

24年前,他们和其他人一起,联手做出了一个“出格”的创举;泰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“飞乐音响”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;黄贵显冒着风险把“飞乐音响”股票卖了出去。

在股民的记忆中,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。

现在,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,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入市融资。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。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。

“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。”泰其斌说,“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,每股50元。”

在深秋的上海,两位已经淡出江湖、颐养天年的老人,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“新中国第一股”的一幕……

###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,就搞了股份制

故事始于1984年。这一年,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。泰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,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,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。

1958年,泰其斌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专业,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。1984年,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。

那时,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,给电视机厂做配套。泰其斌上任的这一年,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,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。那是一段令人轻松愉悦的日子,城市街头,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,《再过二十年,我们再相会》的歌声,是最好的伴奏,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。此外,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,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,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。

泰其斌对市场很敏感,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。他的想法,被主管部门同意了,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,专事音响生产,但在资金、产品完全由计划支配的年代里,这家完全属于计划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,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。

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。泰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,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,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。“股票”这个词,第一次被泰其斌所知,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,泰其斌理解的“股票”,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。

能集到资,当然是件好事,泰其斌回厂里后,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。

就在这之前三年的1981年,一个叫作“国库券”的词,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。这一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,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,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,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。作为中期政府债券,国库券年息4厘,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,自发行第6年起,一次抽签,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,每次偿还总额的20%,10年还本付息。

泰其斌那时认为,国家集资发行“国库券”,企业集资发行股票,一样的道理。他并不知道,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债务关系,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系。他发行股票,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。“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,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,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。”泰其斌回忆说。

就这样,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,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。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,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。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。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,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——改革开放后最早股份制企业之一,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如今,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,泰其斌还是觉得,在那时它就像一个“怪胎”,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,诞生了。

### “保本付息”,使“小飞乐”一天售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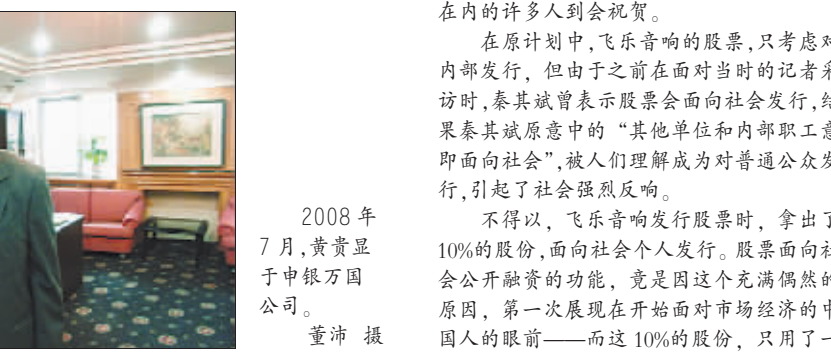
泰其斌想要利用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飞乐音响筹集资金,在没有证券公司的年代,只能由银行代理操作。在那时,银行之间也是分口负责的,工业企业的融资,理所当然要由工商银行来完成。而黄贵显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,开始打报告,申请代理发行,等待上面审批。

由于黄贵显经常做“出格”的事,放下股票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问题不说,就是它对银行自身的影响,也引来了很多争议:“大家都去买股票,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?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?”……

为保证飞乐音响能顺利发行,黄贵显立下军令状:“第一,绝对不反弹旧社会的证券市场;第二,绝不把外国的模式如数照搬;第三,不让国家损失,不搞投机倒把。做得好请领导推广;做不好,由我承担责任。”

实际上,从1984年起,上海已经有一些企业采取向职工集资的方式融资,为了规范这些准股份制企业及其集资行为,1984年7月,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先行一步,制定了《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》,同年8月10日,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办法并颁布实施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,第一个股票管理的政府文件。

两个多月后,1984年10月23日,泰其



■本报记者 董沛 钱培坚

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,是“新中国第一只股票”这个故事的主角——泰其斌、黄贵显。

24年前,他们和其他人一起,联手做出了一个“出格”的创举;泰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“飞乐音响”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;黄贵显冒着风险把“飞乐音响”股票卖了出去。

在股民的记忆中,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。

现在,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,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入市融资。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。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。

“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。”泰其斌说,“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,每股50元。”

在深秋的上海,两位已经淡出江湖、颐养天年的老人,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“新中国第一股”的一幕……

###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,就搞了股份制

故事始于1984年。这一年,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。泰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,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,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。

1958年,泰其斌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专业,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。1984年,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。

那时,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,给电视机厂做配套。泰其斌上任的这一年,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,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。那是一段令人轻松愉悦的日子,城市街头,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,《再过二十年,我们再相会》的歌声,是最好的伴奏,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。此外,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,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,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。

泰其斌对市场很敏感,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。他的想法,被主管部门同意了,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,专事音响生产,但在资金、产品完全由计划支配的年代里,这家完全属于计划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,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。

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。泰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,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,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。“股票”这个词,第一次被泰其斌所知,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,泰其斌理解的“股票”,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。

能集到资,当然是件好事,泰其斌回厂里后,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。

就在这之前三年的1981年,一个叫作“国库券”的词,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。这一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,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,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,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。作为中期政府债券,国库券年息4厘,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,自发行第6年起,一次抽签,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,每次偿还总额的20%,10年还本付息。

泰其斌那时认为,国家集资发行“国库券”,企业集资发行股票,一样的道理。他并不知道,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债务关系,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系。他发行股票,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。“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,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,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。”泰其斌回忆说。

就这样,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,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。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,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。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。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,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——改革开放后最早股份制企业之一,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如今,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,泰其斌还是觉得,在那时它就像一个“怪胎”,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,诞生了。

### “保本付息”,使“小飞乐”一天售空

泰其斌想要利用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飞乐音响筹集资金,在没有证券公司的年代,只能由银行代理操作。在那时,银行之间也是分口负责的,工业企业的融资,理所当然要由工商银行来完成。而黄贵显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,开始打报告,申请代理发行,等待上面审批。

由于黄贵显经常做“出格”的事,放下股票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问题不说,就是它对银行自身的影响,也引来了很多争议:“大家都去买股票,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?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?”……

为保证飞乐音响能顺利发行,黄贵显立下军令状:“第一,绝对不反弹旧社会的证券市场;第二,绝不把外国的模式如数照搬;第三,不让国家损失,不搞投机倒把。做得好请领导推广;做不好,由我承担责任。”

实际上,从1984年起,上海已经有一些企业采取向职工集资的方式融资,为了规范这些准股份制企业及其集资行为,1984年7月,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先行一步,制定了《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》,同年8月10日,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办法并颁布实施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,第一个股票管理的政府文件。

两个多月后,1984年10月23日,泰其

在内的许多人到会祝贺。

在原计划中,飞乐音响的股票,只考虑对内部发行,但由于之前在面对当时的记者采访时,泰其斌曾表示股票会面向社会发行,结果泰其斌原意中的“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工业即面向社会”,被人们理解成对普通公众发行,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对。

不得以,飞乐音响发行股票时,拿出了10%的股份,面向社会个人发行。股票面向社会公开融资的功能,竟是因这个充满偶然的原因,第一次展现在开始面对市场经济的中国人的眼前——而这10%的股份,只用了一天的时间,便被抢购一空!

■本报记者 董沛 钱培坚

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,是“新中国第一只股票”这个故事的主角——泰其斌、黄贵显。

24年前,他们和其他人一起,联手做出了一个“出格”的创举;泰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“飞乐音响”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;黄贵显冒着风险把“飞乐音响”股票卖了出去。

在股民的记忆中,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。

现在,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,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入市融资。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。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。

“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。”泰其斌说,“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,每股50元。”

在深秋的上海,两位已经淡出江湖、颐养天年的老人,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“新中国第一股”的一幕……

###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,就搞了股份制

故事始于1984年。这一年,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。泰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,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,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。

1958年,泰其斌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专业,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。1984年,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。

那时,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,给电视机厂做配套。泰其斌上任的这一年,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,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。那是一段令人轻松愉悦的日子,城市街头,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,《再过二十年,我们再相会》的歌声,是最好的伴奏,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。此外,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,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,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。

泰其斌对市场很敏感,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。他的想法,被主管部门同意了,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,专事音响生产,但在资金、产品完全由计划支配的年代里,这家完全属于计划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,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。

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。泰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,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,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。“股票”这个词,第一次被泰其斌所知,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,泰其斌理解的“股票”,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。

能集到资,当然是件好事,泰其斌回厂里后,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。

就在这之前三年的1981年,一个叫作“国库券”的词,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。这一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,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,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,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。作为中期政府债券,国库券年息4厘,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,自发行第6年起,一次抽签,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,每次偿还总额的20%,10年还本付息。

泰其斌那时认为,国家集资发行“国库券”,企业集资发行股票,一样的道理。他并不知道,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债务关系,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系。他发行股票,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。“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,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,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。”泰其斌回忆说。

就这样,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,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。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,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。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。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,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——改革开放后最早股份制企业之一,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如今,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,泰其斌还是觉得,在那时它就像一个“怪胎”,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,诞生了。

### “保本付息”,使“小飞乐”一天售空

泰其斌想要利用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飞乐音响筹集资金,在没有证券公司的年代,只能由银行代理操作。在那时,银行之间也是分口负责的,工业企业的融资,理所当然要由工商银行来完成。而黄贵显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,开始打报告,申请代理发行,等待上面审批。

由于黄贵显经常做“出格”的事,放下股票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问题不说,就是它对银行自身的影响,也引来了很多争议:“大家都去买股票,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?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?”……

为保证飞乐音响能顺利发行,黄贵显立下军令状:“第一,绝对不反弹旧社会的证券市场;第二,绝不把外国的模式如数照搬;第三,不让国家损失,不搞投机倒把。做得好请领导推广;做不好,由我承担责任。”

实际上,从1984年起,上海已经有一些企业采取向职工集资的方式融资,为了规范这些准股份制企业及其集资行为,1984年7月,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先行一步,制定了《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》,同年8月10日,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办法并颁布实施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,第一个股票管理的政府文件。

两个多月后,1984年10月23日,泰其

是查一下有没有企业重名,没有重名,就算被承认了。那个时候不行,一方面‘公司’是个行政级别单位,一家小小的企业不能叫公司;另一方面,企业必须要套到既有模式里管理,既有模式只有三种:集体企业、国有企业,以及少量的个体经济。”工商局的人问泰其斌,飞乐音响算哪种模式,泰其斌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随后,不停地妥协和迁就,成为泰其斌的主要工作。“你不迁就怎么生产啊!”泰其斌说。以所有制形式为例,为了妥协,泰其斌在工商注册时,只好把飞乐音响归为集体所有制企业。

■本报记者 董沛 钱培坚

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,是“新中国第一只股票”这个故事的主角——泰其斌、黄贵显。

24年前,他们和其他人一起,联手做出了一个“出格”的创举;泰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“飞乐音响”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;黄贵显冒着风险把“飞乐音响”股票卖了出去。

在股民的记忆中,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。

现在,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,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入市融资。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。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。

“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。”泰其斌说,“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,每股50元。”

在深秋的上海,两位已经淡出江湖、颐养天年的老人,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“新中国第一股”的一幕……

###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,就搞了股份制

故事始于1984年。这一年,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。泰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,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,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。

1958年,泰其斌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专业,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。1984年,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。

那时,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,给电视机厂做配套。泰其斌上任的这一年,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,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。那是一段令人轻松愉悦的日子,城市街头,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,《再过二十年,我们再相会》的歌声,是最好的伴奏,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。此外,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,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,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。

泰其斌对市场很敏感,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。他的想法,被主管部门同意了,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,专事音响生产,但在资金、产品完全由计划支配的年代里,这家完全属于计划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,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。

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。泰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,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,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。“股票”这个词,第一次被泰其斌所知,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,泰其斌理解的“股票”,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。

能集到资,当然是件好事,泰其斌回厂里后,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。

就在这之前三年的1981年,一个叫作“国库券”的词,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。这一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,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,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,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。作为中期政府债券,国库券年息4厘,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,自发行第6年起,一次抽签,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,每次偿还总额的20%,10年还本付息。

泰其斌那时认为,国家集资发行“国库券”,企业集资发行股票,一样的道理。他并不知道,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债务关系,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系。他发行股票,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。“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,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,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。”泰其斌回忆说。

就这样,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,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。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,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。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。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,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——改革开放后最早股份制企业之一,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如今,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,泰其斌还是觉得,在那时它就像一个“怪胎”,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,诞生了。

### “保本付息”,使“小飞乐”一天售空

泰其斌想要利用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飞乐音响筹集资金,在没有证券公司的年代,只能由银行代理操作。在那时,银行之间也是分口负责的,工业企业的融资,理所当然要由工商银行来完成。而黄贵显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,开始打报告,申请代理发行,等待上面审批。

由于黄贵显经常做“出格”的事,放下股票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问题不说,就是它对银行自身的影响,也引来了很多争议:“大家都去买股票,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?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?”……

为保证飞乐音响能顺利发行,黄贵显立下军令状:“第一,绝对不反弹旧社会的证券市场;第二,绝不把外国的模式如数照搬;第三,不让国家损失,不搞投机倒把。做得好请领导推广;做不好,由我承担责任。”

实际上,从1984年起,上海已经有一些企业采取向职工集资的方式融资,为了规范这些准股份制企业及其集资行为,1984年7月,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先行一步,制定了《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》,同年8月10日,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该办法并颁布实施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,第一个股票管理的政府文件。

两个多月后,1984年10月23日,泰其

尝试股票,到如今“有上亿的人在炒股”,仅用了17年时间。

■本报记者 董沛 钱培坚

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,是“新中国第一只股票”这个故事的主角——泰其斌、黄贵显。

泰其斌在飞乐音响一直干到1999年,那一年,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泰其斌提前退了下来。记者问他是不是“因为大股东的意愿”,他沉默不答。

相较起开始时,聊起来飞乐音响从无到有创建起来,他需要自己找资金,找员工的历

■本报记者 董沛 钱培坚

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,是“新中国第一只股票”这个故事的主角——泰其斌、黄贵显。

24年前,他们和其他人一起,联手做出了一个“出格”的创举;泰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“飞乐音响”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;黄贵显冒着风险把“飞乐音响”股票卖了出去。

在股民的记忆中,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。

现在,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,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入市融资。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。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。

“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。”泰其斌说,“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,每股50元。”

在深秋的上海,两位已经淡出江湖、颐养天年的老人,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“新中国第一股”的一幕……

###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,就搞了股份制

故事始于1984年。这一年,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。泰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,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,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。

1958年,泰其斌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专业,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。1984年,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。

那时,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,给电视机厂做配套。泰其斌上任的这一年,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,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。那是一段令人轻松愉悦的日子,城市街头,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,《再过二十年,我们再相会》的歌声,是最好的伴奏,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。此外,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,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,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。

泰其斌对市场很敏感,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。他的想法,被主管部门同意了,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,专事音响生产,但在资金、产品完全由计划支配的年代里,这家完全属于计划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,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。

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。泰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,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,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。“股票”这个词,第一次被泰其斌所知,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,泰其斌理解的“股票”,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。

能集到资,当然是件好事,泰其斌回厂里后,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。

就在这之前三年的1981年,一个叫作“国库券”的词,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。这一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,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,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,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。作为中期政府债券,国库券年息4厘,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,自发行第6年起,一次抽签,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,每次偿还总额的20%,10年还本付息。

泰其斌那时认为,国家集资发行“国库券”,企业集资发行股票,一样的道理。他并不知道,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债务关系,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系。他发行股票,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。“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,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,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。”泰其斌回忆说。

就这样,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,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。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,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。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。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,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——改革开放后最早股份制企业之一,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如今,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,泰其斌还是觉得,在那时它就像一个“怪胎”,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,诞生了。

### “保本付息”,使“小飞乐”一天售空

泰其斌想要利用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飞乐音响筹集资金,在没有证券公司的年代,只能由银行代理操作。在那时,银行之间也是分口负责的,工业企业的融资,理所当然要由工商银行来完成。而黄贵显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,开始打报告,申请代理发行,等待上面审批。

由于黄贵显经常做“出格”的事,放下股票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问题不说,就是它对银行自身的影响,也引来了很多争议:“大家都去买股票,银行存款外流怎么办?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?”……

为保证飞乐音响能